

坚守与跨越 丛书
JIANSHOU YU KUAYUE CONGSHU

今日 文坛 第四辑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坚守与跨越 丛书
JIANSHOU YU KUAYUE CONGSHU

今日 文坛

第四辑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今日文坛. 第4辑 /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贵州省
文艺理论家协会编.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 11
(坚守与跨越丛书)

ISBN 978 - 7 - 221 - 08294 - 7

I. 今… II. ①贵… ②贵… III. 文艺理论—文集 IV. I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2636 号

坚守与跨越丛书

今日文坛第四辑

贵州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 编

责任编辑 / 黄 瑛

封面设计 / 陈红昌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 址 /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印 制 /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4.75

字 数 / 260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1000 册

书 号 / ISBN 978 - 7 - 221 - 08294 - 7 / I · 1746

定 价 / 36.00 元

此书获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贵州省文艺创作专项资金资助

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研究

主 编 / 何光渝

执行副主编 / 倪 明

书 眉 题 字 / 戴明贤

编 稿 / 陈 武

李 晶

陈亚丹

白 雪

目 录

CONTENTS

试论精神分析学对我国20世纪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	李朝龙	1
传统之流的一个节点		
——对“五四”歌谣运动及其历史意义的考察	汪青梅	50
关于“孩子”的寓言		
——论陈凯歌电影文化的审美诉求	吕东华	73
跨文化语境下的女性写作		
——解读虹影小说	张馨凌	114
论张天翼讽刺小说中的果戈理影响	张运刚	140
孤独的行客		
——鲁迅作品中的游子情结及其生成根源	何天洋	146
另一道风景		
——论海岩小说影像化的审美效应	李 晶	158
论文化身份对马原西藏书写的影响	杨 红	162
从文化传播看小说《了犹未了》主人公的文化形象	刘祥平	168
浓郁的民族情调 深重的忧患意识		
——简评水族青年作家潘国会短篇小说集《月亮树》、《小黑头》		
	石尚彬	174

“寻根”与“失根”之间

- 从小说《秦腔》中解读文化寻根 李 娜 179

消解与重构

- 王安忆小说《叔叔的故事》的叙述策略 王星虎 187

1990：新写实脉络中的池莉与方方

- 小说《太阳出世》与《落日》之比较 张春艳 195

从远处飘来：女性世界的集体声音

- 从林白小说的个案出发 王美芳 201

游走在身体与历史之间

- 析长篇小说《后悔录》的叙事策略 曹成竹 208

战争中的人性美

- 小说《百合花》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艺术探析 代新林 215

- 从《诗经》到《私人生活》看女性意识的衍化 陈 芳 222

- 后 记 230

试论精神分析学对我国 20 世纪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

李朝龙

【摘要】 自西学东渐以来,精神分析学对我国 20 世纪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作家作品中是不尽相同的。可见,中外思想文化之间既有其共同性,又存在着差异性;任何外来文化,只有与本土文化相适应、相融合,才能得以生存或发展。这是各民族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共同规律。

【关键词】 精神分析学 20 世纪 文学创作 文学批评

精神分析学在中国的传播,并非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也不是二三十年代,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现存的史料表明,最早将精神分析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是一个名叫钱智修的人。他在 1914 年 5 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 4 卷第 11 号上发表了《梦的解析》一文,明确指出:“梦之问题,其首先研究者,为福留特(即弗洛伊德——引者)博士(Dr. Sigmund Freud)。”并说:“福留特氏,谓吾人所不愿遇见之者,乃至吾人所欲为、所欲得者,常于梦中实现之……凡椎鲁无智识之人,所持意见,大都与福氏相似,惟其解释之法,较怪诞而涉于迷信耳。”嗣后,精神分析学在中国的运作,其范围之广,影响之大,除马克思主义外,是其他西方文化思想所难以匹敌的。

精神分析学之所以能在我国广为传播,是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文化背景的。^①其运作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引进期、批判期、隐蔽期和回复期。在此,仅就精神分析学对我国 20 世纪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谈一点粗浅认识,见教于广大专家读者。

一、引进期[1914—1927]

所谓引进期,是随着西学东渐,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传播和运作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精神分析学作为西方心理学一支突起的异军,较为广泛地引起了国人的重视。其运作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1. 积极引进,持客观、肯定的评介居多。

这绝不意味着是照单接收而无批评意见。如《时事新报》主编、《解放与改造》创办人张东荪在肯定“佛洛德(即弗洛伊德——引者)的最大功绩”,是“在心理上确证有‘无意识’”的同时,又认为性欲决定论“不免有太偏的地方”。^②鲁迅在这一时期也不止一次地强调弗洛伊德的“偏执”、“偏激”、“执拗”的缺点,并尖锐地指出其“专一用解剖刀来分割文艺,冷静到入了迷”的做法,是“过度的穿凿附会”。^③甚至也有人持彻底的否定态度,如余文伟在《佛洛特派心理学及其批评》一文中就认为:潜意识只是弗洛伊德假设的产物,没有事实根据,“受不住逻辑的审定与理智的考查”;而梦和儿童性欲的理论也无法证明并违背逻辑。因此他下结论说:“佛洛特(即弗洛伊德——引者)派心理学与神秘主义一样并无多大分别,绝不能成为科学的心理学。”^④但是,当时的大多数人对精神分析学都持肯定的态度。如在《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22期的“科学杂俎”栏内,有一则署名“Y”撰写的科学消息《佛洛特新心理学一斑》就认为,自弗洛伊德创立此种心理学以来,“心理学显已进入革命的时期。旧时学说,大半都受动摇”。并把它出现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哥白尼、达尔文的学说相比,认为“盖其影响于既往学术之大,颇相同也”,是现代科学界“极堪注意的事”。又如,由蔡元培选送留美的汪敬熙,先后在1920年出版的《新潮》第2卷第4、第5期上撰文,不仅肯定精神分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治疗战时精神病之经验,颇足证明其说之不谬”,而且还指出该学说对一般心理学的重大影响在于:“一、证明往日注重知的研究之不当,及本能与情绪实在人心理中占更重要之位置。二、证明实有无意识之存在。此二点也是予一般心理学以重大之打击者。”^⑤也有人认为,它“实可帮助解释人类文化及宗教哲学发达,尤其是艺术及文学的创作天才”^⑥;深信“其为纯正的科学,而非一种邪术”^⑦。总的说来,在此时

的学术界,留美心理学博士余天休的评价是具有代表性的:“无论如何,佛氏于社会终有所贡献。所说被压制之观念,能在健康之常人表现,亦如在精神病人然,皆有实例……总之,无论其缺点如何,佛氏在医学及心理学史上,应占一重要位置。”^⑧

2.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相结合,剖析众多社会文化现象,揭露旧文化、旧道德对人性的摧残以及伪道学家的丑恶嘴脸。

这方面的代表作家作品有鲁迅早期的杂文,潘光旦的《小青之分析》,冯友兰的《国骂》、《再论国骂》,章士钊的《再答吴稚晖先生》以及周作人对当时许多现象所作的批评。

鲁迅是我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最早接触精神分析学的思想家之一。现有资料表明,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已经阅读过有关精神物理学、精神动力学等的西方心理学著作,在 1922 年创作《不周山》(后改名《补天》)以前就已接触精神分析学。在他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强调人的潜意识领域充满本能欲望,这无疑是对假道学者的当头棒喝。而且在其研究中,并不因对象的地位、身份、教养的不同而有所轩轻,“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因此,自“偏执的弗罗特(即弗洛伊德——引者)先生宣传了‘精神分析’之后,许多正人君子的外套被撕碎了”,他们不得不“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⑨总之,有意识地以精神分析之“矢”射封建礼教、正人君子之“的”,是鲁迅这一时期众多杂文的显著特色。如 1918 年,他在《我之节烈观》中指出,节烈是一种“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1919 年,他又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尖锐地抨击了“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一类道学观念;1925 年,他还在《坚壁清野主义》中义正词严地主张:“要风化好,是在解放人性,普及教育,尤其是性教育。这正是教育者所当为之事”,并在同年发表的《寡妇主义》中,还运用精神分析这把无情的解剖刀,将正人君子之流的丑恶嘴脸进行了淋漓尽致致的剖析。

潘光旦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我国最早的信奉者之一。1920 年,他在清华学校聆听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哈罗德·G·奎格利讲授“现代西方文化”课后,便对 20 世纪西方的一些新思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桑塔耶那的理想生活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对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似有偏爱”，并由其“引起他对霭理斯和雍格（即荣格——引者）诸人的理论，发生兴趣”。^⑩1922年，潘光旦在清华学校听梁启超讲授“中国五千历史鸟瞰”时，发现稗官野史中所载明末女子冯小青的传奇故事与弗洛伊德所谓的自恋（narcissism）极其相符，便着手研究并写出一篇读书报告，以《冯小青考》之名发表于1924年出版的《妇女杂志》。三年后，即1927年又“重加厘定，于其性心理变态，复作详细之探讨”，新写了“精神分析派之性欲发育观”一章，充实成《小青之分析》一书，于是年9月由新月书店出版（再版时改书名为《冯小青》）。

冯小青的故事见于江苏常熟支如增撰的《冯小青传》，该传奇由清朝嘉庆举人陈文述的《兰因集》收录。据载，冯小青乃扬州女子，16岁时嫁与杭州一冯姓做妾。“生之妇奇妒，姬曲意下之，终不悦……有杨夫人者，时从姬弈，绝爱怜之。姬性好书，向生索取不得，数从夫人处借观。间赋小词自遣；对佳山水有得，辄作小画。”“又时时喜与影语：斜阳花际，烟空水清，辄临池自照，絮絮如问答；女奴窥之即止，但见眉痕惨然。”“自后夫人从夫宦游，姬益寥阒，遂感疾。医来，姬佯作谢，俟出，掷药床侧，叹曰，‘吾纵不愿人世，亦当以净体皈依，作刘安鸡犬，宁以一杯鸩断送耶！’乃作书贻夫人；书未达而疾益甚；水粒俱绝，唯日饮梨汁少许。”忽一日，觅一良画师画像，画像成，“抚几而泣，泪与血俱，一恸而绝。年才十八耳”。^⑪通过对冯小青生平、诗词、书信以及其他材料的研究，潘光旦对照弗洛伊德在《论自恋》中关于纳斯西斯（narcissus）故事的评述，深感虽相距百年，相去万里，而“二宗事案之相合，何以竟若符节？”于是运用精神分析对小青的遭遇“明其真相穷其原委”。潘光旦认为：处女时代的冯小青虽已显露其自恋的端倪，但仍与常人无异。婚后因年幼体弱，其夫又为富家子弟，性憨跳不韵，更谈不上温存体贴，其性心理所受之搏击，真可谓苦不堪言——冯小青在与杨夫人的书中说：“结缡以来，有肖靡旦，夜台滋味，凉不如斯。”可见，其变态心理实为婚后“不堪性经验之蹂躏而发”。由此，潘光旦得出结论云：“小青适冯之年龄，性发育本未完全；乃受重大之打击，而无以应付，欲性之流乃循发育之途径而倒退，其最大部分至自我恋之段落而中止；嗣后环境愈劣，排遣无方，闭室日甚，卒成影恋之变态。”这一结论，很显然套用了弗洛伊德幼儿性欲理论中关于“力比多”因“执著”、“退回”而形成神经症根源的说法。在该书最后，潘光旦还以清代女

子的诗词特多“愁”、“病”、“凄清”、“寂寞”、“断肠”、“怨”、“恨”、“哭”、“泣”、“无言”、“不语”等等词语说明,历代女子,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女子,盖因体力脆弱,精神抑塞,不呻吟不足以宣泄所致。而追究“其原因大都与性生理和性心理之不能自然发展有密切关系”^⑫。认为只有实现了性观念的变更、性教育的加强、男女社交的公开,受着封建传统观念压抑而生变态的妇女才能逐渐归于常态。不难看出,潘光旦对冯小青之精神分析,目的在于抨击封建的旧文化、旧道德,这与“五四”时期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像潘光旦这样运用精神分析学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的还有哲学家冯友兰。冯友兰可能是从鲁迅将“他妈的”讽为“国骂”受到启发,认为“他妈的”之所以在中国如此流行,是由于“中国对于性欲之礼教最严——性欲受压最甚,故发泄性欲之别路,亦为最多”所导致的,各种方言的“国骂”都是出自于“以弥其缺憾”。^⑬因此在他看来,“析心术派心理学之下意识说,能解释许多事实”,虽“反对析心术派的人诚多,但据我所知,析心术所能解释之事实,他们还大部分不能解释。所以下意识说,还不见得就是‘无理’哩”。^⑭

章士钊是我国现代学者中唯一与弗洛伊德有过通信联系的人。1923 年秋,他在从欧洲回国的途中,就曾读过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只是“反复诵之,词气骤难尽晓,故中途执卷未释”^⑮。回国后,他继续阅读其有关著作,则受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在 1926 年 1 月 16 日出版的《甲寅周刊》第 1 卷第 27 号上发表的《再答吴稚晖先生》一文中,他就曾以意识受压和双重人格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从民间“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说起,引出如下一番议论:“近弗洛伊德言心解者流,极重 subconsciousness 之用。谓吾人真正意志,每于无意识中发焉;而凡所发,则又在意识用事时正言否之。此人生一奇也。”以此来指责吴稚晖的言行不一——“先生之为人亦此”,“先生之论文亦然”。

周作人是“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性学家,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他半生所读的书中,性学书给他“影响最大”,而性学家“皆我师也,他们所给的益处比圣经贤传为大”。^⑯虽然他最喜爱的性学家是英国的霭理斯,而霭理斯与弗洛伊德是同时代人,在对潜意识、压抑、升华、自恋以及其他变态性心理的认识,对性欲及禁欲、纵欲的态度方面,两人都是十分相

近的。如周作人完全赞同霭理斯在《圣芳济及其他》中的一段话：“有人以禁欲或耽溺为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将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生活之艺术，其方法只在于微妙的混合取与舍二者而已”。而弗洛伊德也曾言：“假如他们在治疗完成之后，能在性的放纵和无条件的禁欲之间选取适中的解决，那么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不必受良心的责备了。”¹⁷可见，周作人在这一时期以及以后的文章中，虽然引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远没有霭理斯的那么多，但在分析社会文化现象，特别是在抨击封建假道学家的变态心理时，也必然显示出精神分析的色调。如在长篇论文《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中论述但丁的创作时，他说：“人多关闭在自我的果壳里，不易解脱，只有在感着男女或亲子之爱的顷刻，才与普通的力相接触，有一个出离的机会。”因此，他着重介绍了但丁9岁时与贝亚特丽齐的恋爱，并认为诗人20年后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即献给贝亚特丽齐的《新生》是“醇化的恋爱观的结晶”。这与弗洛伊德论歌德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观点极其相似，都旨在对性的压抑、发泄和升华的解说。又如，他在《猥亵的歌谣》中说：“猥亵的歌谣，赞美私通种种的民歌，却是有些动机而又不实行的人所采用的别求满足的办。他们过着贫困的生活可以不希求富贵，过着端庄的生活而总不忘却快乐，于是唯一的办法是意淫。那些歌谣即是他们的梦，他们的法悦（Ekstasia——引者：销魂入迷的意思）。"¹⁸从而不仅把“意淫”在歌谣中的“满足”看成是可以超越物质生活之上的需要，而且还认为这“意淫”可以在梦和“法悦”中获得幻想的满足。这与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所阐述的观点可以说如出一辙。再如，他在《论女裤》、《拜脚商兑》、《拜发狂》等文章中认为：道学家们之所以规定女学生衣着“袖必齐腕，裙必及踵”，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怕窥见人家而心荡神摇”¹⁹的变态心理在作怪；“对女子肤发衣饰的变化感到极大的刺激，无论是不安或狂喜，都是有点变态的，或者竟是色情狂的”；中国封建时代妇女缠足之恶习，说明“事实上中国人仍不得不暂时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的拜脚——是拜毁伤过的脚的民族”，是“拜脚狂”加“淫虐狂”的性变态心理的表现，是弗洛伊德所谓的“色性倒错”。²⁰

3. 不少有影响的作家、文学批评家将精神分析运用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中。

“五四”时期的学人们不仅反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而且也反对传统的艺

术表现手法。由于精神分析学对人的本能欲望的重视、对人的潜意识心理的解剖以及对文学创作的独特认识,因此,凡对精神分析学予以关注的文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将这一理论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和批评中,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一笔亮丽的色彩。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在理论上:强调文学是自我的表现,是作家各种欲望的宣泄和升华。其代表作家有郭沫若、成仿吾、郑伯奇、郁达夫、汪静之、周作人等,而尤以创造社的同仁们表现得最为突出。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影响较大的社团之一,它的大多数成员在这一时期竭力主张文学是自我的表现,是“苦闷的象征”。如作为创造社元老之一的郭沫若,早在 1920 年就认为“生命是文学的本质。文学是生命的反映”^①。稍后,又针对当时功利主义的动机说提出:“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无论它是反射的或创造的,都是血与泪的文学。”^②再后来他甚至宣称:“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③在郭沫若宣称他所信奉的文学的定义之前,成仿吾也曾撰文认为“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要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文学既是我们内心的活动之一种,所以我们最好是把内心的自然的要求作它的原动力”。^④与此同时,郑伯奇也肯定“艺术只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⑤。在 1927 年出版的郁达夫的《文学概论》和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诗歌原理》中,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郁达夫认为,人有一种从内部产生的求生的本能,“从心理的进化方面来说,‘生’就是使无意识的活动变为有意识的,有意识的活动变为反省的,反省的活动变为道德的活动的动机”,这种求生的本能“具象地表现在我们身上”,“表现就是创造”。而艺术,“除表现(即创造)外,另外是什么也没有的”,而这“表现”所需要的媒介物,就是“象征”。^⑥汪静之也认为,艺术创作的根本动机在于“人类求乐与慰苦这个心底里的根本欲望”,无论是从创作还是从鉴赏角度,抒发郁闷都是一种欲望通过悲剧的升华。即使是诗人唱出欢悦的歌,动机仍是“求乐与慰苦”,在苦恼中向往欢乐,犹如受冻者梦见狐衣貂裘,单身汉梦见美女,穷书生梦见中状元,全是欲望的实现,所以“又可说一句‘诗者,梦也’了”。^⑦此时,郭沫若的《〈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批评与梦》,周作人的《欧洲古代文学上的妇女观》、《沉沦》等,可以说是我国早期精神分析批评的代表作。如在郭沫若看来,《西厢记》这部古典名剧“是有

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因为“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种族之蕃演由是,人文之进化也由是”。然而,由于“我国素以礼教自豪,而于男女间之防范尤严,视性欲若洪水猛兽,视青年男女若罪囚,于性的感觉尚未十分发达以前即严加分别以催促其早熟”。加之“年青人最富于暗示性……更于无意识之间,或在潜意识之下,生出一种反抗心:多方百计思有以满足其性的要求。然而年龄愈进,防范愈严,于是性的焦点遂移转其位置而呈变态”。所以,“数千年来以礼教自豪的堂堂中华,实不过是变态性欲者一个庞大的病院!”这些观点,可以说完全是弗洛伊德关于性欲受压抑找不到宣泄之路而导致精神病的观点。不仅如此,作者还从人的本能欲望与封建礼教的矛盾来分析作品,指出:“《西厢记》所描写的是人类正当的性生活,所叙述的是由爱情而生的结合,绝不能认为奸淫,更绝不能作为卖淫的代辩!”从而既肯定了“正当的性生活”应是青年男女恋爱婚姻的自然基础,又通过对《西厢记》所作的精神分析向封建礼教发出了控诉。同时,他还运用精神分析学的欲望升华理论,“揣想王实甫这人必定是受尽种种箝束与诱惑”而被逼成的“变态性欲者”,由于他“把自己的感情早早破坏了,性的生活不能完完全全地向正当方面发展”,于是通过《西厢记》的创作来表现自己“困顿在肉欲的苦闷之下而渴慕着纯正的爱情”。郭沫若认为:“这部《西厢记》也可以说是‘离必多’(libido)的生产——所谓‘离必多’是精神的创伤(psychic trauma),是个体的性欲由其人之道德性或其他外界的关系所压抑而生出的无形伤害。”并进而指出,王实甫写《西厢记》与屈原写《离骚》、《九歌》,与蔡文姬写《胡笳十八拍》,与苏蕙写《织锦回文诗》一样,都是“到了无论如何都不能生活的时候”,“才借艺术以鸣,以鸣其所欲”。^⑧

二是在实践上:反对传统文艺讲故事、重情节(客观叙述)的表现形式,主张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注重对性心理的压抑、苦闷和变态的描写,以揭示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摧残和“正人君子”的虚假面孔。这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1)重视潜意识和梦境的描写。中国文学中对于梦境的描写并非始于现代,而是古已有之。如在唐传奇中就有《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和《三梦记》,而后,自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到曹雪芹的《红楼梦》,可以说不计其数。然而,那些梦尽管曲曲折折地说明了一些问题,但总带有古老的迷信色彩,

往往是人与神鬼之间交往的桥梁。“五四”时期文学中的梦境描写,则是对主人公潜意识的展示、内在欲望的表达。其代表作有鲁迅的《兄弟》、《离婚》、《明天》,郭沫若的《残春》、《月蚀》、《喀尔美萝姑娘》,郁达夫的《风铃》(后改名《空虚》),杨振声的《贞女》、《玉君》,王以仁的《神游病者》,许杰的《暮春》、《白日的梦》等。

(2)着力于变态心理和变态性心理的揭示。在鲁迅早期的创作中,不仅通过对变态性心理的描写直接而又形象地揭露了正人君子之流的污秽心态,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而且还展现了平常人的变态心理,如在《狂人日记》以及《野草》的若干篇章中,我们都不难发现鲁迅对他笔下主人公的变态心理所作的深刻而细腻的描写。此外,郁达夫的《沉沦》、《茫茫夜》、《怀乡病者》、《过去》、《迷羊》,张资平的《约伯之泪》、《梅岭之春》,叶灵凤的《姊嫁之夜》、《女娲氏之遗孽》,许杰的《黑影》、《萤光中的灵隐》、《雨后》、《火山口》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3)强调“力比多”创造了文化和文明。其代表作有鲁迅的《不周山》(后改名《补天》,收入《故事新编》)和郭沫若的《Löbenicht 的塔》。据鲁迅自己说:“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只不过取了弗罗特(即弗洛伊德——引者)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②,”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③。于是便有了小说第一节中女娲从梦中惊醒后的“懊恼”、“无聊”和用软泥捏成小人时感到的“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后来,“见了一位道学的批评家攻击情诗的文章,心里很不以为然,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④。从而使这篇小说既肯定了人的本能欲望是创造力的源泉,同时还揭露了假道学家的丑恶嘴脸。郭沫若的《Löbenicht 的塔》,认为“力比多”是铸就康德成为 19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奠基者的动力所在。

总的说来,当时的这类作品,正如不少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虽不乏只是皮相地在创作中搬用精神分析学的幼稚粗浅之作;更有像鲁迅那样有所选择地将精神分析当做外来文艺思潮之一,“拿来”为我所用,创作出融精神分析、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于一炉的优秀之作;也有像郁达夫那样的作家,汲取了弗洛伊德对“性”的某些观念,但并非照单全收,创作出既富有强烈的精神分析色彩,又保持着自身独特风格的作品;还有像郭沫若、王以仁

等,采用类似意识流的手法刻画人物的潜意识,从而使自己的创作别具一格等等。总之,“五四”时期的不少作家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欲与当时世界最新文艺潮流接轨,于是引进并运用精神分析于自己的创作和文艺批评中,从而无论是在观念和方法上,还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批判期[1928—1937]

这是一个阶级斗争十分激烈而民族矛盾又不断加深、国内国际局势极其尖锐复杂的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中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为传播以及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提倡“革命文艺”,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已成为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在国内,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虽然政治情势急剧恶化,但曾经鼓吹“革命文艺”,甚至直接参加过革命实践的文艺家们聚集上海,仍想在蒋介石政权的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文艺运动,于是便开启了此后10年间的左翼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左翼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坚持革命现实主义、提倡文艺大众化、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等方面,都作出过巨大贡献,功不可没。但是,由于当时在党内极“左”思想路线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以及日本福本主义的影响下,站在运动前列的弄潮者们错误地估计了正处于革命低潮的政治时局,提出了一系列完全脱离中国现实的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主张。他们不仅反对封建文艺,也反对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步文艺在内的一切文艺,甚至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也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主张“文学是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是“观念论的灵魂,是个人主义者的呓语”,主张“文学的任务在描写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是“小生产者的意识把戏,机会主义的念佛”;^⑤而“代替他们而起的”只有“无产阶级的文艺”^⑥。他们不仅否定“同路人”、“第三种文学”的存在,还鼓吹“谁也不许站在中间”^⑦,将大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卓有成就的文艺家排斥在左翼文艺运动之外。甚至还组织围攻鲁迅,说鲁迅“没有抓住时代”,“不曾追随时代”,^⑧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⑨,其创作是“滥废的无意义的类似消遣的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滥废的文学”^⑩。在文艺观念上,他

他们将文艺等同于政治,艺术形式等同于思想内容,创作方法等同于世界观;鼓吹文艺是政治的机关枪、留声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宣传,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等等。1930 年左联成立后,他们虽然对自己偏激过火的言行有所认识,并在实践中也有所收敛,但由于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的偏激不但没有被彻底肃清,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新的发展。加之国民党对苏区的五次围剿与左联五烈士的壮烈牺牲,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扩大与中国工农红军的北上抗日,华北五省自治与“西安事变”等等,构成了这一时期国内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局面。在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精神分析学受到认真而严厉的批判也就势所必然了。

再说,在国际范围内,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又是精神分析学在西方广为传播并得到肯定的年代。自 1922 年起,每隔一两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都按例在德国的柏林、汉堡,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因斯布鲁克和瑞士的琉森等地召开大会。至 1926 年止,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伦敦、莫斯科、加尔各答和瑞士、美国各地都先后建立了精神分析协会。维也纳、柏林和伦敦还设立了精神分析门诊部,并逐渐创建起几个训练研究中心,出版了欧洲大陆各协会的机关刊物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等几种杂志。在维也纳,还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的《弗洛伊德全集》。此时,其创始人弗洛伊德不仅成了西方学术界所崇拜的重要人物,不少精神分析的术语,如“自我”、“压抑”、“潜意识”等等,也成了知识界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用语。因此,当 1926 年弗洛伊德 70 寿辰时,不仅奥地利官方首次通过广播介绍了他的生平,维也纳各报和德国一些报纸发表了祝贺文章,而且还收到勃兰兑斯、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世界闻名的作家和科学家的贺电。1930 年,弗洛伊德又荣获“歌德文学奖”,以至于 1933 年希特勒上台后,尽管有关精神分析的书刊被禁,弗洛伊德本人也受到恐吓,但许多国际学术团体,包括英国皇家学会在内还授予他名誉会员的称号。尤其是 1936 年他 80 寿辰时,由世界各地 191 名最杰出的作家和艺术家如托马斯·曼、威尔斯、茨威格等集体签名的贺信,以及爱因斯坦 4 月 21 日发自美国普林斯顿的祝贺函,更是将他在世界上的声誉推到了顶峰。在国内外如此悬殊的背景下,精神分析学在我国的运作及其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不可能不是纷繁复杂的。这主要表现在: